

从“文明工具”到“独立学科”：翻译历史定位的知识社会学考察

邱 蝶

四川师范大学 四川 成都 610100

【摘要】：翻译的历史定位变化，一直同人类社会的知识生产、文化建构和社会转型有着密切的联系。本文以知识社会学为研究视角，对翻译在古代、近代、现代和当代四个历史阶段的功能定位演进脉络进行梳理，分析翻译从文明交流的基础工具、思想革新的思想载体、学术体系中的独立学科建制化发展，最后形成多元复合功能形态的内在社会逻辑。研究表明，翻译本质就是跨越语言边界，实现意义创造性再生的文化实践，它的定位演变一直以人和文化为维度展开，具有知识传播、文化融合、社会建构等多重价值。面对技术时代，翻译研究要在智能技术的加持下提高效率，又不能放弃人文价值，必须牢牢抓住文化中介这一核心，不断给跨文化交流、文明互鉴提供支撑。

【关键词】：翻译历史定位；知识社会学；学科独立；文化实践；意义再生

DOI:10.12417/3041-0630.26.07.067

翻译是在社会发展至一定阶段、产生跨语言交流需求时才应运而生的核心文化实践，并在此后不断演进。它的功能定位与社会结构的变迁、知识形态的演进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共生关系。从古代文明的跨区域互动，到近代社会的思想转型，再到现代学术体系的建制化发展，直到当代技术语境下的实践形态革新，翻译一直起着知识生产、传播和重构的作用^[1]。知识社会学关注知识和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研究知识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是怎样被建构、传播和制度化的，为拆解翻译定位变迁的深层逻辑赋予了关键的剖析架构^[2]。研究以历史脉络为线索，分析不同社会语境下翻译定位的建构逻辑和实践形态，最终落脚于技术时代翻译核心价值重审与坚守。

1 古代文明语境中翻译的工具性建构与知识生产功能

1.1 跨区域文化共同体形成中的媒介属性

古代文明的发展一直伴随着地域边界的突破和文化互动的加深，翻译成了文明交流的主要媒介，其媒介功能首先表现在跨区域文化共同体的塑造上^[3]。东亚大陆以汉字典籍为载体的文本翻译和传播，使共享伦理规范、制度体系、价值观念的文化圈形成起来，使分散的区域文明产生了内在一致的文化共同体。中东地区大规模的典籍翻译运动把希腊、波斯、印度等各个文明的知识成果传入阿拉伯世界，不但把多区域的知识汇聚、整合起来，而且形成了一个跨越中亚、北非的伊斯兰文化共同体。翻译不是简单的语言符号的转换，而是知识体系的空间流动、文化认同的主动建构，为古代世界的文明互鉴提供了一条不可替代的纽带^[4-5]。

1.2 文明存续的知识保存与代际传递机制

古代文明的存续一直受到战乱、政权更替造成的知识散佚风险的威胁，翻译在此时被赋予了文明保存的主要功能，成为跨越时间、空间的文化记忆载体。许多古典文明的核心典籍在原地散佚消亡之后，却经由翻译在异域文明中保存并延续了知识^[6]。希腊古典时代的哲学、科学典籍在本土散佚之后，经过系统的翻译转换成阿拉伯语文本保存下来，在数百年后又通过二次翻译回流到欧洲，成为文艺复兴运动重要的知识来源。西夏文明的核心文献在政权灭亡之后，用蒙古语译本保存了文化记忆，成了后世还原文明面貌的主要依据。翻译的保存功能不是被动的文本复制，而是一种主动的知识选择和价值再创造，使人类文明的核心成果冲破了地域和时代的束缚，达成跨代际的传承和再生。

1.3 本土文化系统更新的内生催化动力

翻译既是外来知识的输入通道，又是本土文化系统自我革新和文明建构的重要力量，它的价值在古代文明中已经超出了单纯的工具属性，深深地参与到文化体系的内生性重构当中。异质文明的知识成果经过翻译进入本土语境之后，就会同本土的思想体系、认知框架发生深度碰撞，促使本土文化实现创造性重构和文明形态的再生^[7]。佛教思想经由不断的文本翻译进入中原地区之后，同本土的儒道思想达成深度融合，进而形成完全本土化的禅宗流派，完成了外来宗教哲学的本土再造和文明建构。阿拉伯学者在翻译希腊科学典籍的基础上，结合本土的观测实践和研究传统，使天文学、数学等学科取得突破性发展，实现了外来知识的本土化创新和文明体系的内生跃升。翻译从来不是知识的简单叠加，更不是被动的工具性转换，而是主动参与文明建构、推动文化系统自我超越的内生动力^[8]。

2 近代社会转型中翻译的思想载体属性与范式重构

2.1 民族危机语境下翻译功能的转向逻辑

在近代社会剧烈转型、民族国家生存危机的推动下，翻译的功能定位发生深刻转变。明末清初，耶稣会士与本土知识分子的合作翻译已初步引入西方科技与思想，翻译开始承载知识更新与认知拓展的功能。鸦片战争以后，亡国灭种的生存危机使这一进程急剧加速和全面深化。社会对于西方文明的认识由器物层面逐渐深入到制度和思想层面，翻译的内容也从军工技术典籍逐渐扩展到政法制度、哲学思想等核心领域^[9]。翻译的主体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早期传教士和官方译员主导的技术型翻译，逐渐被具有强烈启蒙意识的知识分子群体主导的思想型翻译所取代。这一转向的核心逻辑，在于本土原生的思想资源已无法回应社会转型的紧迫需求，翻译成为引进外来思想、推动社会变革的必然选择，其社会价值和历史定位也因此实现了质的飞跃^[10]。

2.2 思想启蒙中翻译的话语生产与社会动员

甲午战败以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知识分子通过翻译引进西方的进化论思想，结合本土社会语境进行创造性的话语重构，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核心逻辑唤醒全社会的危机意识和变革诉求^[11]。翻译时译者并没有对文本进行忠实的复制，而是根据本土社会需要对文本进行创造性的阐释和发挥，使外来思想能够准确地回应时代的核心问题，成为推动社会变革的思想武器。该类翻译实践彻底破除了传统的认知迷思，实现了全社会的思想启蒙，给后来的制度变革和社会运动提供了主要的思想资源，直接影响了几代变革者的行动路线，体现出翻译作为思想载体强大的话语生产和社会动员能力。

2.3 本土知识体系转型的底层重构力量

近代翻译实践带来的不仅是具体的思想成果与知识内容，更是本土知识体系底层范式发生根本性改变，促使传统的知识体系向现代学术体系转变。从洋务运动时期的技术典籍翻译，到戊戌变法前后政法制度翻译，再到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文学和哲学翻译，翻译实践的发展过程，就是本土知识体系不断完成范式重构的过程^[12]。知识权威来源的转向就是儒家经典单一权威向多元开放的世界学术资源的转变，知识分类体系的重组就是现代学科分类体系通过翻译进入本土语境，打破了传统的经史子集分类框架，思维方式的深层转型就是科学理性、民主平等核心观念通过翻译逐渐内化为本土认知体系的核心组成部分，为现代学术话语体系的形成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3-14]。

3 现代学术体系中翻译的学科独立与知识合法化进程

3.1 翻译研究学科边界的建构逻辑与合法化策略

翻译研究在现代学术体系中具有学科独立性，并不是单纯的知识发展所导致的，而是社会建构出的一种合法性知识。20世纪中期以后，全球化进程加快，人文学科的格局发生改变，给翻译研究从语言学、比较文学的附庸中解放出来创造了制度上的条件。霍尔姆斯1972年提出的学科框架，表面上是对研究对象、边界和内部结构的学理界定，实际上就是翻译研究共同体为了争取学术资源、学科席位和象征资本而采取的一种边界工作策略。该框架把翻译学分为纯翻译学和应用翻译学，再细分为理论翻译学和描写翻译学，其深层功能就是建构出一套可以被学术体制所识别、承认的话语体系，从而实现从实践技艺到合法知识的身份转换。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来看，这并不是学术分工的自然发展，而是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知识群体为了获得合法性的主动选择。此后欧美高校学位项目、专业期刊、学术组织相继成立，正是合法化策略的制度固化，使翻译研究从边缘走向中心，完成了现代学科的身份建构。

3.2 多元理论介入中研究范式的知识政治与话语竞争

学科边界的确立给翻译研究打开了理论介入的门户，但是多元范式的拓展不是简单的学术繁荣，而是知识场域内部的话语竞争和权力博弈。结构主义语言学最早给翻译研究提供了一套看似中立的语言分析框架，把翻译简化为语言系统之间的规则转换，实际上是对翻译活动社会性、文化性的系统排除。哲学阐释学的引入，把翻译提升到人类理解活动的本体论层面，批判了语言学范式的技术主义倾向，但是也带来了方法论模糊的新困境。功能主义理论以“目的决定手段”为命题核心，试图重建翻译研究的实践导向，但是很难避免工具理性膨胀的风险。文化转向之后，翻译被置于权力、意识形态、诗学规范的宏观语境中，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社会学等视角相继介入，使翻译研究成为人文社会科学交叉对话的场域。这一系列范式更迭的深层动力，不单来自于学术认识的深化，更来自于不同的理论流派对于学科定义权和象征资本的控制竞争。翻译研究范式的拓展，本质上就是一场关于“翻译之根本是什么”的知识政治过程。

3.3 从实践技艺到元反思的知识社会学跃迁

翻译学科独立的本质就是它完成了从实践技艺到反思性学术的知识社会学跃迁，实现了知识生产模式的根本性变革。古代和近代阶段翻译主要以实践形态存在，主要关注翻译操作的技术问题，知识积累主要依靠经验总结和规范传授，一直停留在实践知识的层面。现代翻译学科的产生，把翻译活动本身作为反思性研究的对象，实现了从实践操作到理论反思的中心

转向。元反思在本体论上追问翻译活动的本质属性和核心边界，在认识论上探究人类认识翻译活动的主要途径和基本框架，在方法论上建立翻译研究开展的学术规范和分析路径。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来说，翻译学科的独立不是简单的学术事件，是战后全球化社会需求、相邻学科的学术滋养、高等教育扩张的制度支持三者共同作用的结果。从实践到元反思的跃迁，使翻译研究有了独立的知识生产能力，理论自觉也成了翻译独立学科的重要标志。

4 当代技术语境中翻译的多元定位与人文价值重审

4.1 全球化进程中翻译功能的多元化

进入新时期，翻译活动越来越呈现出多维度特征，尤其在“走出去”国家战略的大力实施以及信息技术与翻译科技的突飞猛进这两方面因素影响下，翻译的路径、形式、方法、功能与目标等都发生着深刻变化。这些变化使翻译研究和翻译实践不断面临新的挑战^[5]。在文学外译的历史语境中，究竟应该如何认识、如何理解翻译活动呈现出的丰富性与复杂性，这些迫切需要译学界对翻译的本质、定位、功能与价值等翻译根本性问题进行重新思考。当代全球化进程不断深入，社会分工不断细化，翻译的功能定位由单一的语言转换活动转变为社会各个领域的复合型文化实践。从文化传播的角度来说，翻译成为国家文化软实力竞争的主要手段，典籍外译、影视内容的跨国传播，都必须依靠翻译来完成文化价值的传递和国家形象的塑造。

从社会治理角度来说，翻译在跨国交流、移民融合、公共卫生应急等领域发挥着建构性的中介作用，国际组织的多语种沟通、跨国公共事件的信息传递、移民群体的社区融合，都离不开翻译的社会整合功能。就技术应用而言，智能技术的介入使得翻译成为人机协同的跨领域实践，翻译生产的流程和效率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三种功能不是互相取代的，而是互相交织、互相支撑的，文化传播依靠技术工具的效率支撑，社会服务依靠人机协同的模式优化，技术发展依靠文化理解的最终归宿，共同构成了当代翻译多元复合的功能定位。

4.2 智能技术介入下翻译实践的边界重构

人工智能技术迅猛发展并广泛使用，正在重新塑造翻译实践的边界和形态，也给翻译的定位变迁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神经机器翻译技术可以实现实时多语言转换、大规模文档快速处理、垂直领域术语精准匹配，在技术手册、法律文件等程式化文本的处理上，远超人工，也彻底改变了翻译生产的传统流程。但是当涉及文化符号传递、情感意蕴表达和深层语境

理解的时候，智能翻译的不足就暴露无遗。智能翻译只能实现语言符号的表层对应，不能理解语言背后所蕴含的历史记忆、文化认同和情感内涵，也不能进行有创造性的意义再生。本质上就是技术工具和文化实践的差别，技术可以实现标准化的语言转换，但是不能取代人类对文化语境的深刻理解以及对意义的创造性的再构建。智能技术介入之后，翻译实践的边界被重新界定，译者从机械重复的语言转换工作中解脱出来，把更多精力放在了翻译活动中的文化阐释和意义再生上。

4.3 人机协同中翻译核心价值的坚守与回归

智能技术时代翻译的发展不是人类和机器的零和博弈，而是在人机协同模式下翻译功能的重新分配和核心价值的回归。翻译的实践模式正由人工主导的单语言转换，向人机协同的全流程翻译生产转变。译者利用技术工具完成基础的语言转换和术语统一工作，把主要精力放在风格把控、文化匹配、情感传递和伦理把关等机器无法完成的核心环节上。翻译的协作模式也从译者的个体作业，转向人机协同、人人协作的多元合作网络，译者与技术工具、委托方、领域专家形成了多层级的协作关系。与之相应，翻译人才的培养模式也由以前以语言能力为中心的技能训练，转变为以人机协同能力为中心的综合素养培养，未来的译者不但要掌握技术工具的操作能力，还要有深厚的文化阐释能力、伦理判断能力和创造性翻译能力。人机协同时代，翻译的本质没有发生改变，依然是跨越语言边界实现意义再生的文化实践，技术改变的只是实现手段，而翻译的人文价值和文化传播属性，反而需要得到更坚定的坚守和更充分的彰显。

5 结论

纵观翻译历史定位的演变历程，其始终沿着工具、载体、学科、多元媒介的清晰路径发展，每一次定位的转换，都是特定社会语境与知识生产需求共同作用的结果。古代文明语境里，翻译成了文明交流的主要手段，促使跨区域文化共同体的产生，把文明成果保存下来并革新本土文化。近代社会转型时期，翻译成了思想革新主要的载体，肩负起救亡启蒙的历史任务，促使本土知识体系发生范式转变。在现代学术体系当中，翻译完成了独立学科的建制化过程，完成了从实践技艺到元反思的知识跃迁。在当代技术语境之下，翻译表现出多元复合的功能形态，也遭遇着技术带来的新挑战。翻译的历史定位变迁一直以人和文化这两个核心维度为依托，跨越语言界限实现意义再生的本质没有改变。技术时代翻译的发展要实现技术效率和人文关怀的动态平衡，始终坚守文化中介的核心价值，给人类文明互鉴和共生提供持续的支持。

参考文献:

- [1] 王晓路.论翻译的历史文化功能:认知模式与知识谱系[J].外语教学与研究,2021,53(02):263-272+320.
- [2] 周领顺.翻译批评的跨学科定位:框架语义学视域[J].中国翻译,2024,45(02):5-13+189.
- [3] 傅敬民.翻译作为独立学科的新时代中国翻译教育[J].外语电化教学,2023,(01):11-13.
- [4] 李广寒.文化记忆视阈中翻译的再生产功能探析[J].江西社会科学,2020,40(09):248-253.
- [5] 杨仕章.文本三维结构视阈下文化翻译功能研究[J].外国语(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报),2021,44(05):92-101.
- [6] 石英.知识社会学视域下的人工智能:原理、功能及影响[J].人文杂志,2025,(05):1-14.
- [7] 李阳阳.新时代跨文化传播下语言翻译功能新视角探究——评《跨文化传播背景下的翻译及其功能研究》[J].外语电化教学,2022,(05):103.
- [8] 张昆群.英语专业翻译教学的定位与改革[J].海军工程大学学报(综合版),2020,17(01):90-92.
- [9] 唐绪华.翻译史研究的学科定位与发展前景——兼评《劳特利奇翻译史研究手册》[J].上海翻译,2023,(03):89-94.
- [10] 牟海涛.功能翻译理论视角下中日跨文化交际与翻译人才培养研究——评《中日跨文化交际视角下的翻译研究与教学》[J].中国油脂,2023,48(06):163-164.
- [11] 龚扬.影响翻译的社会文化因素探究——评《社会文化系统中的翻译:身份与作用》[J].领导科学,2021,(21):125.
- [12] 胡开宝.人工智能背景下我国翻译学科的转型与发展[J].山东外语教学,2026,47(01):2-12.
- [13] 周港,周晓虹.从古典到现当代:知识社会学的理论结构[J].江汉论坛,2026,(01):138-148.
- [14] 李成静,杨佳,邓天文.技术效能与文化适应:生成式人工智能在中医典籍翻译中的双维考察[J].上海翻译(中英文),2026,(01):52-56.
- [15] 傅敬民.关于人工智能时代翻译研究范式重塑的思考[J].外语与外语教学,2025,(06):1-9+18+144.